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编
鄂 州 博 物 馆

文 物 出 版 社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

湖北省博物馆编
鄂州市博物馆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外文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11.5

统一书号：11068·1377 定价：6.80元

序

俞伟超

我国古代铜镜的形态发展，据现有资料，大致可分为齐家文化和商代、西周至春秋初，春秋晚期至西汉初，西汉中期至东汉初，东汉中期至南北朝前期，南北朝后期至唐初，盛唐至五代，辽宋金元，明清这几个大阶段。这本图录收集的鄂城出土铜镜，主要是汉末、东吴、两晋时期的。

我国金石学家著录古镜，是从北宋末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开始的。但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来研究我国古镜，却是由日本发其端。这一则是因为近代考古学的发生在日本要早于我国，二则是因为日本的弥生文化和古坟时代遗存中包含着大量从中国传去的汉、三国、六朝古镜，日本的考古学者为了研究本国的古代文化，也必然要研究中国古镜。

本世纪初，日本的富冈谦藏对我国的汉、三国、六朝古镜开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形态学考察^①。继而，梅原未治、后藤守一等人又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类和年代学研究，同时蒐集、著录了大量资料^②。后来，我国的梁上椿也做过一定规模的分类工作^③。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主要是依靠失掉共存关系甚至出土地点的传世品来进行分析的，自然只能对其形态的分类和变化勾划出一个大概轮廓，难以真正弄清楚它们的发展谱系，更谈不上寻找各时代铜镜工艺的地区特点了。

但到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大发展，这种情况就不断地、迅速地发生变化。例如，当1953年发掘了洛阳烧沟的225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墓葬后，根据这一时期铜镜的主要形态，便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其年代了^④。后来，通过洛阳舟山的发掘^⑤，以及七十年代以来长沙马王堆^⑥、江陵凤凰山^⑦等地汉初墓葬的发掘，汉初铜镜的年代就可以更进一步弄清楚了。现在，如果汇集建国以来全国各地的发现，已经完全可以有条件建立起两汉铜镜流变的详细谱系。

关于汉末、三国、两晋的铜镜，最初主要是通过日本的出土物得到一些了解^⑧。后来，传世品也不断出现。1936年在浙江绍兴古墓中出土了三百多面铜镜，这是一次重要的集中发现^⑨，揭示出了会稽山阴（即今绍兴）这一东吴铸镜中心的特殊风格。汉末、

三国、两晋铜镜，流行纪年铭文，又常常铸出作坊和作坊所在地的地名，这不仅便于进行年代学考察，而且可据而进一步研究当时铜镜工艺的地区性。当然，要进行后一项工作，还需要有较多出土地点明确的材料，而这在解放以前却尚未具备。

经过近三十年来新资料的积累，现在已有可能寻找汉末和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地铜镜特点的眉目了。其中，魏、蜀的材料还比较零散，以吴镜的发现最为集中。这主要就是湖北鄂城和武昌等地的出土物，尤以鄂城出土的为多。鄂城大量铜镜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增加了对东吴铜镜总特点的认识，而且揭示出了三国前后会稽山阴以外东吴的又一铸镜中心便是当时的武昌（即鄂城——现已改为鄂州市）。

鄂城在汉代为江夏郡的鄂县。因地处长江中游的要冲，当汉末之际，东吴便大力经营此地。《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孙权于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自公安迁都至此，更名武昌；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迁都建业，但仍以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同书《孙皓传》谓至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时，孙皓又曾迁都于武昌，次年十二月仍还都建业，由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终东吴一代，此地有十年建为都城，其余时间则为行都，是当时邺、成都、建业以外的第二等城市，无怪乎会成为一个铸镜中心。管维良同志在前言中曾据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和鄂城湖北钢厂所出黄武元年（公元222年）的武昌“官作铜釜”，指出了东吴时期当地采铜之盛。从所出大量铜镜情况看，该地当是仅次于会稽山阴的东吴铸镜中心之一。

会稽山阴发展成铸镜中心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汉末建安年间。如本书图44的半圆方枚神兽镜即铭曰：“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戊午朔^⑧十九日起^{□□□}也。道其者，会稽所作，中有六寸一千也。人者服之千万年，长仙，作吏，宜官，吉羊，宜侯王，家有五马千头羊，[□]羊[□]女子具富昌^{□□□}。”这是已发现的会稽铸镜中最早的一面纪年镜，会稽铸镜的开始时间，一定还要早些。

还有一面同铭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⑨。那面镜子传出绍兴，说明当时的会稽铜镜铸出后，有的在本地使用，有的则远传至鄂城等地。

汉末的鄂城已经有了自己的铸镜业，图59、60的龙虎镜可以为证。图60的龙虎镜，铭文为“朱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时节五菽孰。”“朱氏”作坊之名，又见于传世的三面建安十年的重列神兽镜铭文中（《纪年镜》34、35页）。这个“朱氏”作坊如果因为传世的那三面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铜镜不知出土地点，不便确定其铸地，那么图59镜铭中的“李氏”作坊，却又出现于本书图23的同一时代的浮雕式鸟兽纹带龙虎镜中，而在绍兴镜中却从未见过。鄂城出的两面镜子既然都带“李氏作镜”铭文，这个作坊很可能就在当地。

鄂城铸镜业的兴盛，大约在黄初元年（公元222年）孙权迁都于此以后不久。有一面传出长沙的半圆方枚神兽镜，其铭为：“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官涑（三）章，

乃而清明，吉羊。”（《纪年镜》图版23之一）那时，凡用铭文标明的铸镜地点，都是有名望的铸镜中心，如东汉的“尚方（指真正表示作坊名称的“尚方”）和“广汉”、“西蜀”，曹魏的“右尚方”和“徐州”，东吴的“尚方”（亦指真正表示作坊名称的“尚方”）和“会稽山阴”等等。这面黄初二年镜既标明是“武昌”所作，足证武昌镜必定也已负有盛名了。

本书图110重列神兽镜，又说明了鄂城铸镜业最初是由于引进了会稽山阴的著名匠师而发展起来的。这面铜镜铭曰：“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②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镜，照明服者也。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臣先牛羊马，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干昔□□”。前面说“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竟”，后言“家在武昌”，显然是讲会稽山阴的作师在武昌铸镜。

鲍唐所作铜镜，在鄂城还发现了五面。它们是：

图108重列神兽镜，铭：“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明，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蕃昌。”

图109重列神兽镜，铭同上。

图93半圆方枚神兽镜，铭：“□□四年五月丙午朔③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今造大毋王三。”

图104重列神兽镜，铭：“黄武四年六月五日丙辰作长明镜。服者大吉，寿得万年，鲍师扬名无已，人去之”。

图112重列神兽镜，铭：“黄龙二年七月丁未朔七日癸丑，大师鲍豫而作明镜。玄溲三（商），灭绝孚秽，服者高迁，位至竹帛，寿复者石也。”

此外，“鲍唐”作镜还有一面传世品半圆方枚神兽镜，出土地点不明。铭为：

“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④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民治服者也。□□今造□□□。”（《纪年镜》46页）

如果仅仅看这七面“鲍唐”作镜的铭文，黄武六年以前的四镜就可以认为是在会稽铸作的。但既然它们绝大多数都出在鄂城，而在传出绍兴的古镜中只能见到“王氏”、“吕氏”、“骆氏”、“田氏”“为氏”、“伯氏”（或作“柏氏”、“柏师”）、“杜氏”、“周氏”与“周仲”、“徐伯”、“大师陈世严”、“师郑”、“师卜德□”、“安本里思子丁”等作坊或匠师之名，没有“鲍唐”（皆见《绍兴》、《纪年镜》和《浙江出土铜镜选集》⑤），可知“鲍唐”主要是作武昌镜，传世的那面黄初四年镜大概也是在鄂城铸作的。

东吴会稽镜中最富特色的是一种浮雕式的神人或人物画像镜，在鄂城也曾出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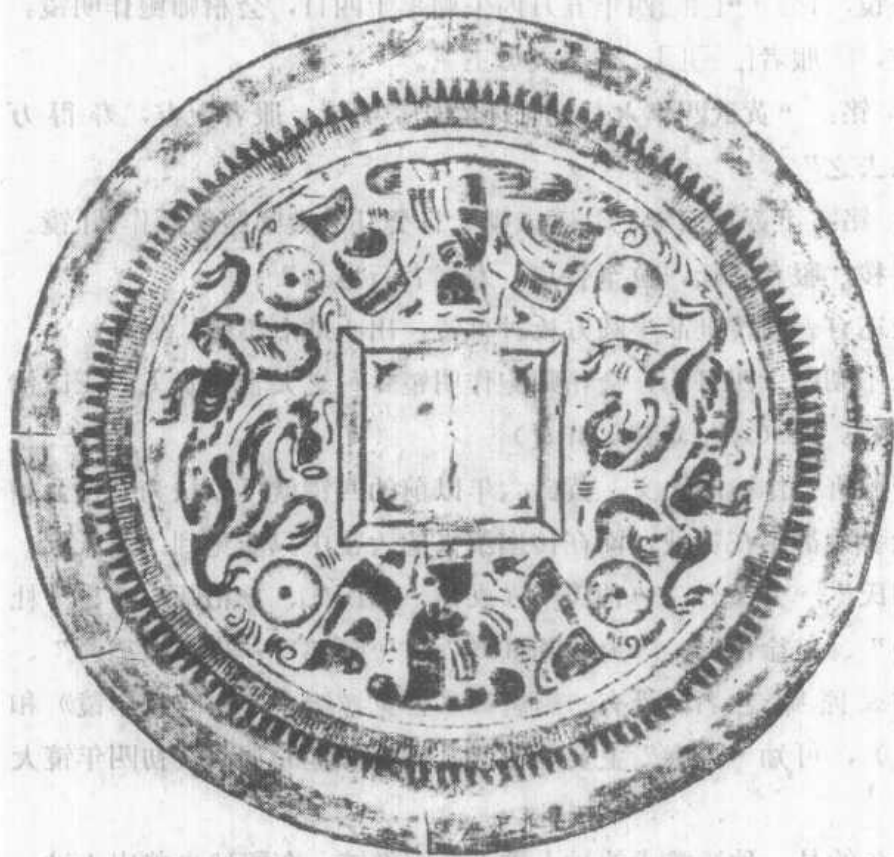
这种镜子在绍兴一带出土的数量很大，如《绍兴》一书便收录了五十四面，《浙江》一书也采录了十面；可是在鄂城却只收集到三面（图118—120）。鄂城出土的这三

面铜镜,会不会是从会稽传入的呢?细加分析,这三镜是有其自身特点的。例如图118、119两镜都作成绍兴镜中少见的神人鸟兽纹带形式,各有两组对坐的仙人,不见东王公与西王母,而在已经著录的绍兴镜中,只有一面“杜氏作珍奇镜”是这种风格,但其中仍有“西王母”像(《绍兴》图50)。又如图120,虽是作成绍兴镜中最多见的四区式,但东王公与西王母之旁,都只有侍者一人,而绍兴出土的几乎都有二人或三人相侍,况且镜铭中的“荣氏”作坊,亦不见于绍兴诸镜。这种风格的神人画像镜,最近为访楚王城而在秭归县文化馆又见到一面当地的出土物。这些在湖北出土并具有特色的画像镜有很大可能是鄂城自铸镜而不是会稽镜。

还有一种风格同会稽镜几乎一样的画像镜,例如最近在荆门县文化馆见到二面出自当地的神人龙虎画像镜,其图像的布局和浮雕作风与绍兴镜极为类似。其中一镜径16厘米,组座外带方格,无铭(插图一);另一镜径18.6厘米,铭为“袁氏作竟真大巧,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山人子乔、赤踊子,千秋万岁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插图二)其“袁氏”作坊不见于会稽镜铭,估计可能也是鄂城所铸。综合这些材料,可以推测武昌的铸镜业曾从会稽移入了非常精致的神人画像镜工艺,虽然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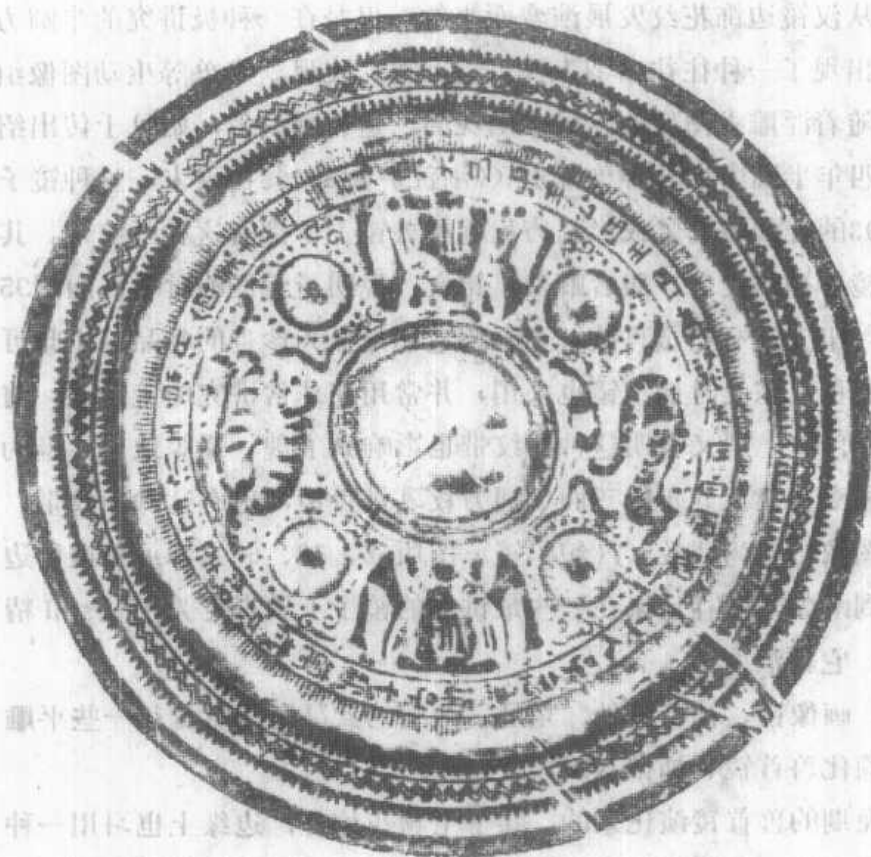
展了一点自身的特点,

但基本风格却是一致的。



插图一:神人龙虎画像镜
(湖北荆门出土,1979年手拓)

本书收集的材料表明,东吴时期的武昌镜是以浮雕式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为其主要内容,“鲍唐”作的那几面镜子,就都是这种形式。拿它们和绍兴出的同类镜子相比,真是维妙维肖,简直是会稽镜的翻版;但和四川、陕西出的同类镜子相比,则差别自明,例如在四川昭化和广元出土的蜀镜,其半圆方枚



插图二：神人龙虎镜
(湖北荆门出土，1979年手拓)

乳神兽镜系统的诸镜，神人图像少见，主要是鸟、兽图像，而且流行一种以方枚乳和动物图像相间的画纹带^⑧；这是与会稽镜、武昌镜不同之处；尚未发现重列神兽镜。在陕西西安、乾县出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其神人和怪兽的形态就比较呆滞，而且，外缘上流行的那周流云纹类似于后代的忍冬纹，与会稽镜、武昌镜中的云纹带都不相同；其外缘内常见的一道动物画纹带也同蜀镜类似而不如东吴的画纹带那样生动^⑨。

显然，“鲍唐”等匠师确是把绍兴的优秀工艺带到了鄂城，故武昌镜的工艺传统和会稽镜属于同一个系统而与魏、蜀之镜的风格不同。

当武昌的铸镜业发达起来以后，由于武昌和建业之间的频繁往来，一些会稽镜肯定还会传到武昌。图111那面分段式重列神兽镜就大概是从会稽传入的。

此镜铭曰：“黄龙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壬子朔^⑩十三日甲子，陈世^⑪造作三涑明镜，……久富贵”。“陈世严”是当时的铸镜名匠，还有三面传世铜镜是他铸造的。一面是环带状神兽镜，铭为：“黄武七年七月丙午朔^⑫七日甲子纪主治时，大师陈世严作明镜。服者立至公。”另二面是和图111之镜同年作的分段式重列神兽镜，铭曰：“黄龙元年大岁在己酉九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严）造三涑明镜。其有服者久富贵，宜□□□□□”；“黄龙元年太岁在己酉七月壬^⑬十三日甲子，师陈世（严）造作百涑明镜。其有服者，命久富贵，宜□□。”（《纪年镜》60—62页，黄武七年的“陈世严”作镜传出南中国，产地很可能是浙江，“陈世严”可能是会稽“大师”，那麽图111的镜子估计也是会稽铸造的。）

这时各种神兽镜的边缘上，流行锯齿纹、棘刺纹、流云纹、怪云纹和一种类似涡形

的云纹等装饰，这些都是从汉镜边饰花纹发展演变而来的。但是在一种极讲究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的边缘上，却出现了一种往往由羽人操舟、奔龙、飞凤、走兽等生动图像组成的画纹带。它显然是伴随着浮雕式图像的发展而出现的。这种画纹带，始见于传出绍兴的一面非常精致的中平四年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上（《浙江》图28）。在汉末，这种镜子是罕见的，但本书图95—103的九面方枚乳或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上，都有这种画纹带。其中，图96之镜有“吴造明镜，神圣毅容，服者卿公”铭文，说明了它们的时代，而图95—97三镜又都是通背鎏金，纽上还有错金兽纹，又表明它们是极为珍贵的物品。由此可知，画纹带是汉末起源于会稽，东吴时武昌镜也采用，并常用在非常讲究的镜子上。前述陕西、四川出土的两种神兽镜，则又表明这种画纹带也影响到了魏、蜀等地。传世的西晋泰始六年、泰始九年和南齐建武五年的三面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也有这种画纹带，最后一镜更作出飞龙引舆图像，尤为精致（《纪年镜》图版56、58、67），可见这种边缘在长江中下游一直沿用到南朝，而且后来在一些最讲究的镜子上做得更为复杂和精细。顺便说明，再晚一些，它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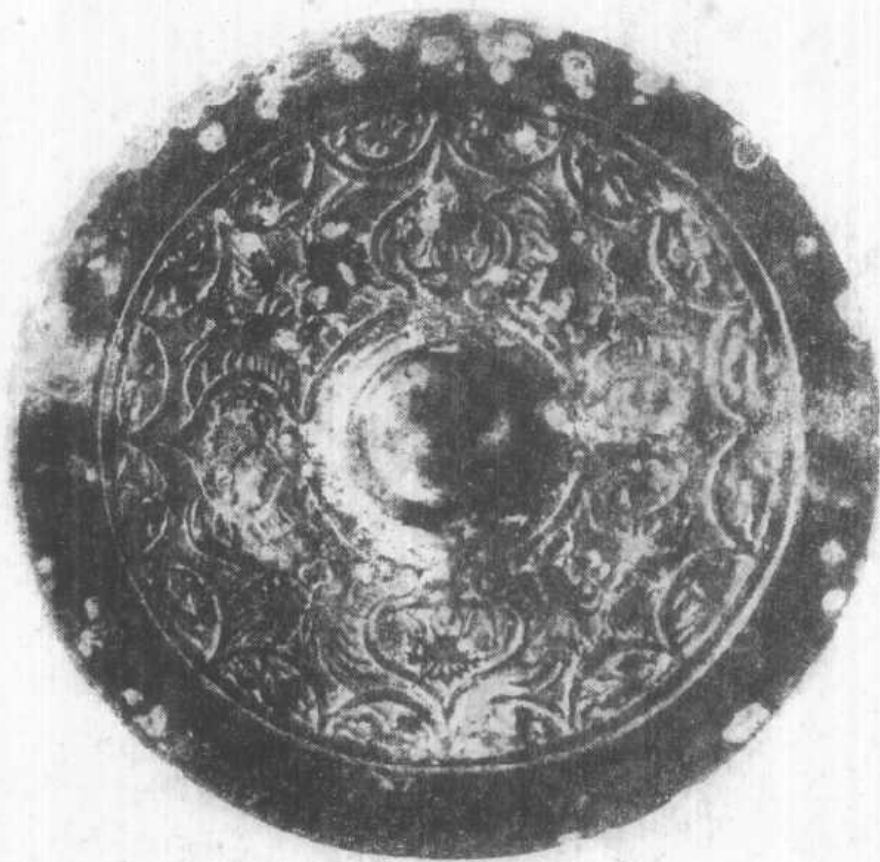
除了浮雕式的龙虎镜、画像镜、神兽镜外，东吴、西晋的武昌还同时流行一些平雕式花纹的铜镜。这主要是简化兽首镜和柿蒂八凤镜。

简化兽首镜是从东汉晚期的兽首镜演化来的，除了主题花纹外，边缘上也习用一种承自东汉兽首镜边饰的菱格云纹。如果拿图69、70这三面简化兽首镜外缘的菱格云纹同传世的一面曹魏甘露四年、甘露五年“右尚方师”所作兽首镜的边缘花纹相比（《纪年镜》图版27—29），可以看出二者极为接近。故可将简化兽首镜的时代，定在东吴时期。

图71—74的四面柿蒂八凤镜，则是从东汉的那种过去习称为夔凤镜的系统演化下来的。现知最早的柿蒂八凤镜，可早达东汉冲帝时，有一面传世镜即带“永嘉元年”之铭，并称“造作广汉西蜀尚方明镜”（《纪年镜》图版6），也许就是四川地区先发展起来的。鄂城所出的这四面柿蒂八凤镜，其图案的平雕风度，同于上述简化兽首镜，时代应当是相同的。

这种铜镜的再进一步发展，就变为图75—82那种镜子，本书称之为变异柿蒂八凤镜。其花纹更趋繁缛，在边缘的十多个内向连弧纹中心和中央的四个蒂瓣中心，也填以生动的动物图像。这种镜子曾出土于江西瑞昌马头地区的西晋墓^②，故可将其年代定为西晋，并将其前身，即图71—74那几面柿蒂八凤镜定为东吴之物，当不会有多大出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这种变异柿蒂八凤镜中间，还常常出现反映佛教信仰的图像。例如图81在三个蒂瓣的中心，各做出一尊结跏趺坐的释迦像；另一个蒂瓣的中心，则是一尊勇猛跏坐的释迦像，佛后有侍者一人持伞盖，佛前有一菩萨跪像。四尊佛像皆带背光，下有莲座，外面更作出佛龕之形，所以很容易辨认出他们是佛像。



插图三：变异柿蒂八凤佛兽镜

（采自后藤宋一《古镜聚英》）

类似的变异柿蒂八凤佛兽镜，过去还有三面流至国外。一面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镜背一个蒂瓣的中心有一尊带背光并有莲座的结跏趺坐释迦像（插图三）^②。一面曾陈列于美国福格美术馆（The Fogg Museum of Art）是在一个蒂瓣中心做出—尊带背光的结跏趺坐释迦像，其旁有胁侍菩萨二人；镜缘上的两个内向连弧纹的中心，又各有一个带背光的飞天像（插图四）^③。还有一面藏于德国国立博物馆的东方部（Ostasiatis-

che Kunst abteilung, Statens Museum），是在三个内向连弧纹的中心，分别作出一尊带背光的立佛像、坐佛像和大象（插图五）^④。在铜镜上铸佛像，起于三国，日本奈良新山古坟出土过一面曹魏的三佛三兽镜^⑤，这是把神兽镜中的神人变为佛像，它同变异柿蒂八凤镜中的佛兽镜，显然分属两个系统。像变异柿蒂八凤镜那种佛兽镜既然已经见到四面，似可说明到西晋时佛教信仰已比三国时要普遍了。

综观汉末、三国、两晋的铜镜，可以看到那时的铸镜工艺当以东吴地区居首位，许多别具新格的型式，特别是浮雕式的龙虎镜、画像镜、重列神兽镜、画纹带等镜上的新工艺，都是在这里首先发展起来，而后影响各地的。东吴的铸镜工艺可说是达到了我国古代铸镜史上的一个新高峰。西晋之时，它还勉强保留在一定的高度上。一到东晋，则已普遍地衰落下去。此后，确有个别的南朝镜子还做得很精致，但直到南北朝后期整个铜镜工艺才重新发展起来。这批鄂城出土的铜镜，正是集中反映了汉末至西晋时期东吴地区的一个仅次于会稽山阴的铸镜中心的工艺面貌，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尽管这批材料已经失掉了与其它遗物的共存关系，不无缺憾，但发表了这样集中的材料，一定会引起考古学、古代史、美术史、冶金史等多方面研究者的重视。

一九七四年八月赴盘龙城遗址发掘的前夕，我在鄂城县文化馆第一次见到这批铜镜时，便曾建议将它们整理成书。经湖北省博物馆和鄂州市博物馆同志们的努力，现在全书告成，因略述数端，以志其缘。



插图四：变异柿蒂八凤佛兽镜
(采自梅原末治《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

注 释

① 见富冈谦藏《古鏡の研究》，九善株式会社，1920年。

② 关于汉、三国、六朝镜的著作，日人梅原末治著《支那古鏡概説》，载（增订）《泉屋清赏》，日本，京都，1934年；《绍兴古鏡聚英》（以下简称《绍兴》），桑名文星堂，1939年；《汉三国六朝纪年鏡图説》（以下简称《纪年鏡》），桑名文星堂，1943年；《汉三国六朝纪年鏡总目》，《考古学杂志》第40卷第4号，1955年3月等。

日人后藤守一著有《汉式鏡》，《日本考古学大系》第1卷，雄山阁，1926年；《鏡》，见清野谦次编《考古学讲座》第10本，雄山阁，1931年；《古鏡聚英》，大塚巧艺社，1942年等。

③ 梁上椿《声宣藏鏡》，北京百华大印印刷局，1940—1942年。

④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⑤ 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出土古鏡》，文物出版社，1959年。按：此书所谓“防洪一段”即舟山之地。

⑥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七期。

⑦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⑧ 参看①和②《汉式鏡》。

⑨ 参看②《绍兴》。

⑩ 建安二十一年四月的朔日是庚午，鏡銘誤記。類似的誤記之例甚多，可見當時是隨便鑄出的。

⑪ 见②《汉三国六朝纪年鏡总目》。



（采自梅原末治《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
插图五：变异柿蒂八凤佛兽镜

- ⑫ 黄武六年十一月的朔日是癸巳，镜铭误记。
- ⑬ 黄武四年五月的朔日是丁未，镜铭误记。
- ⑭ 黄初四年五月的朔日是戊子，镜铭误记。
- ⑮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简称《浙江》。
- ⑯ 沈仲常《四川绍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118、119页；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省出土铜镜》图40、41，文物出版社，1960年。
- ⑰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图75—78，文物出版社，1959年。
- ⑱ 黄龙元年的干支是己酉，七月的朔日是癸丑，镜铭皆误记。
- ⑲ 黄武七年七月的朔日是戊午，镜铭误记。
- ⑳ 黄龙元年七月的朔日是癸丑，九月的朔日才是壬子，这三面黄龙元年镜，一面作“九月壬子朔”，另外二面作“七月壬子朔”，显然本来应当都作“九月壬子朔”。
- ㉑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第1期。
- ㉒ 见②《古镜聚英》上篇图版36之5。
- ㉓ 参看梅原末治《欧米ゴ見た佛像き表はした三面の古鏡》，《欧米に于けみ支那古鏡》111—113页，插图21之二，刀江书院，1931年。
- ㉔ 同上注113、114页，插图21之一。
- ㉕ 参看②《汉式镜》122、123页第102图，《古镜聚英》上篇图版59之1。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概述

管维良

我国铜镜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早在商代，就已经生产铜镜，^①但其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粗糙。春秋晚期以后，铜镜的制作工艺有了很大发展，这个时期的铜镜，形制规整，纹饰复杂，制作水平大大提高。战国中期，铜镜制作中更出现了金银错、透雕、镶嵌等装饰技法。到了汉三国六朝时期，铜镜工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湖北鄂城（今鄂州市）地处长江中游要冲，汉代为江夏郡的鄂县，三国时曾为吴国都城。地下文物非常丰富，但在解放前没有进行过科学发掘。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文物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出土的几百面铜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铜镜出土地点遍及鄂城城关、东、西郊和南郊。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认为鄂城出土铜镜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江浙输入，一是在当地铸造。

鄂城铜镜与江浙地区出土的汉三国六朝铜镜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艺术风格和图像内容上两者有很多一致或接近之处，主要镜类也基本相同，在有些镜铭中还发现江浙镜师的姓名，如“会稽山阴鲍唐、扬州会稽山阴师鲍唐、“吴师”等。

另外一部分铜镜可以认为主要是在鄂城铸造的。首先，鄂城和鄂城附近产铜，有丰富的制镜原料。据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记载：“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又据考古调查，发现鄂城丁祖公社的铜灶、泽林公社的小铜山等地皆有开采铜矿和炼铜的遗址，至于东邻鄂城的大冶县铜绿山，是近年发现的一个古代大型采铜冶铜遗址^②，虽然目前只发现了春秋战国到汉代的遗迹，估计三国至南朝时期很可能继续开采。另据《禹贡》记载，荆州出锡，鄂城地属荆州，锡是易于取得的。

其次，鄂城有官营铜器作坊。一九七七年八月在湖北钢厂发掘出了一件纪年异形铜釜，其肩部有铭文：“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武昌”、“官”。显然，当时吴国在此设有官营铜器作坊，从生产数量来看，这个官营作坊是有相当规模的。

第三，鄂城有制镜匠师。传为长沙出土的黄初二年半圆方枚神兽镜镜铭曰：“黄初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三期

^② 铜绿山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二期

二年，武昌元作镜，官（？）凍章乃而清冒吉羊”（引自梅原未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再一面是一九五六年鄂城樊口朱家垸第21号墓出土的分段式重列神兽镜，铭文曰：“吴黄武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镜，照明服者，宜子孙，阳遂，富贵老寿，□□牛羊马，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服，吾王于昔□□”。前者是吴镜不是魏镜，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记载：“（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曹丕）称尊号，改元黄初。……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被封为吴王。到黄初三年孙权才称帝，改元“黄武”，所以在黄初二年臣属于魏的孙权仍使用魏的“黄初”年号。至于“元”字，或者是镜师的名字，或可作“开始”、“首先”讲，无论何种解释，在武昌制镜则是无疑的。后者镜师鲍唐原籍会稽山阴，以其“家在武昌”之铭文来看，他是后来迁居鄂城的一位铸镜师，既有铸镜师，当时有铸镜作坊是可以肯定的。

从以上三点考虑，鄂城当时应有制镜作坊，并能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因而出土铜镜数量较多。

从鄂城铜镜出土情况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数量多，总数达几百面。计有战国、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等朝代，其中汉三国六朝镜，特别是东汉到东晋的铜镜尤为丰富，显然是同鄂城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

第二，种类繁多，特别是汉三国六朝镜，可以说是荟萃了当时的主要镜类，这为进一步研究铜镜发展演变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三，纪年镜多，包括从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9年）至吴宝鼎二年（公元266年）的纪年镜二十五面。纪年镜在一地出土如此集中，实属罕见，这就为鄂城铜镜的分类和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四，有比较少见的镜类和镜铭。如将佛像铸在铜镜上的四叶八凤佛兽镜、直铭云纹镜、凤尾镜等镜类，把四方四色相结合的“王言昔者具东方之光、日月之明，西方是火光，南方金色，北方水清，……（按：应为“南方是火光，西方金色”，此处疑误铸）以及叙述制镜过程的盖惟彰（顺？）竟，变巧名工，彼（破）山采易（锡），仗石索同（铜），翼（即单、同丹）火雷（卢、即炉）冶，幽涑三商”等镜铭，都是罕见的。

第五，镜上较多地出现后来刻划的文字。内容主要是“镜主”姓名官爵，如“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都尉蒋敬吏张昭镜”等字样；或注明镜面直径或镜缘周长的数据，如“价人竟六寸半”、“番据镜个二尺一寸”等。

第六，铜镜图像内容上受道教影响较深，尤其是神兽镜之神，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道教信仰的神仙，或被道教化了的传说人物。有些铜镜铭文上直接铸上了天皇、五

帝、西王母、东王公、黄帝、王乔、赤松子、柏子高等名号，这对进一步研究当时铜镜工艺与道教的关系很有意义。

鄂城出土的汉三国六朝铜镜，经过初步探索，根据其形制、图案的承袭演变关系，试分为以下八个系统：（一）四乳禽螭纹镜系统；（二）规矩四神镜系统；（三）鸟兽纹带镜系统；（四）龙虎飞禽镜系统；（五）柿蒂纹镜系统；（六）夔纹镜系统；（七）神兽镜系统；（八）画像镜系统。在每个镜系内，依其内容上的差异，又分成不同的型和式，而将暂时无法归并入上述镜系的，列为第（九）类。

（一）四乳禽螭纹镜系统

此镜系以镜中突出的四乳钉和被乳钉所分隔的四组禽纹或螭纹为特点，依形制可分为二型3式：

I型 四乳四螭镜 镜中四螭作横“S”状，可以看出它是由蟠螭纹镜演变而来，出现于西汉昭、宣以后，沿用到东汉初。

II型 四乳禽纹镜类 此型特点是由四乳相间一些比较细小的鸟纹，可分3式：

1式 四乳四禽镜 主纹为四乳相间四禽。四禽图案有线纹、有浮雕，有行走、有飞翔，流行时代当在东汉前期。另有一种，主纹为五乳五禽，其风格与此式完全相同，故归于此式，时间亦为东汉前期。

2式 四乳八禽镜 其主纹为四乳相间成对的八禽，其鸟形近于规矩四神镜的鸟纹，流行于西汉末到新莽时期。

3式 翔鹤飞鸿镜 此式镜主纹为飞翔的四支鸿、鹤，鸿、鹤作成浮雕式，间以四乳，是此型中晚出的一式，为六朝初期作品。

（二）规矩四神镜系统

此镜系是由其最初的镜类具有完整的规矩四神图案而得名。规矩纹在西汉初、中期就出现在蟠螭纹镜、草叶纹镜上，到西汉末年以后大量流行。所谓“四神”是象征天上四方星宿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依其形制可分为四型：

I型 规矩四神镜 主纹除具有完整的规矩四神图案外，其间往往还夹杂一些鸟兽纹。这种镜起自西汉末，盛行于新莽时期，东汉早期继续流行，个别还见于东晋墓。

II型 规矩八禽镜 规矩间的图案改为八禽，流行时代从新莽到东汉初。

III型 简化规矩四神镜 这种镜将规矩纹简化成卍形，四神中的玄武也由一兽代替，流行时代应是东汉初期到东汉中期。

IV型 方格乳钉纹镜 主纹为一大方格，方格外每方饰一小乳钉，此型是III型的简化，制作较粗，与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第八十页图四十二之二所收

景的一面吴太平□年镜基本一致，亦应为东吴所制。

（三）鸟兽纹带镜系统

此镜系主要以四神图案演变而来的鸟兽纹组成的环带为主题纹饰，可分七型：

I型 七乳七鸟纹带镜 此型由七乳间七禽组成一纹带为主纹，其鸟形与四乳禽纹镜II型相同，故时代偏早，约为东汉初。

II型 四乳（或五乳）鸟兽纹带镜 这种镜在图案上打破了四神格局，以龙、凤或其它鸟兽纹组成一环带形的主题纹饰，属东汉时期。

III型 变异四神镜 此型镜中规矩纹绝迹，四神图案也发生了变化，或白虎与玄武易位，或用麒麟代替玄武，属东汉时期。

IV型 浮雕式鸟兽纹带龙虎镜 此型在主题鸟兽纹带上与III型相同，但有的已从单线变为浮雕式，并在镜钮下出现浮雕的龙虎各一只，应是东汉晚期所制。

V型 浮雕式鸟兽纹镜 主纹为相互追逐的五鸟兽，仅有浮雕的轮廓，属东汉晚期到六朝初期。

VI型 浮雕式龙凤镜 此型风格稍异，但图案龙凤的格调是一致的，属东汉时期。

VII型 简易鸟兽纹镜 制作极粗糙简略，属西晋时期。

（四）龙虎飞禽镜系统

此系铜镜以龙虎或飞禽为图案的主题，可分四型6式

I型 龙虎纹镜类 此类铜镜装饰花纹以浮雕龙虎为主，可分4式

1式 龙虎镜 此式由浮雕式鸟兽纹带龙虎镜的高浮雕龙虎座增大为主纹而来，鸟兽纹带亦演变为少许兽类或一些其它图案置于龙虎的下端。开始于东汉晚期，盛行于六朝初期。

2式 变异龙虎镜 主纹虽仍是龙虎，但与1式迥异，浅浮雕，龙虎反向，基本上游离于座外，制作较粗，属西晋时期。

3式 三龙镜 主纹系浮雕的三龙，其中两龙相斗，制作较差，属西晋时期。

4式 四虎镜 主纹四虎，浅浮雕，两两相斗，属六朝早期。

II型 三兽镜 主纹为浅浮雕三兽，互相追逐，形状仅具轮廓，有的镜边为三角缘，属东汉末到六朝初期。

III型 怪兽镜 主题纹饰兽纹类似辟邪，制作较粗，属西晋时期。

IV型 飞禽镜 此类形制小，主题鲜明，且采用三角缘，可分2式

1式 飞鸟镜 主纹为一大飞鸟，鸟身压在镜钮之下，属六朝初期。

2式 飞凤镜 主纹为一大飞凤，凤身亦压在镜钮之下，属六朝初期。

（五）柿蒂纹镜系统

这一镜系以当时最流行的柿蒂纹为装饰图案，柿蒂纹最初以钮座花纹出现，逐渐发展成为主纹，可分五型10式：

I型 云雷连弧纹镜 此型主纹为云雷纹和连弧纹，镜钮有小柿蒂座，时属东汉初期到东汉中期。

II型 连弧纹镜类 主纹仅见连弧纹。在各类铜镜中，连弧纹是附属於其它主纹的配置花纹，但在这类镜子中，其它主纹却完全简化了，可分2式

1式 连弧纹镜 此种镜的主纹仅为连弧纹，钮的柿蒂座略有增大，属东汉中期。

2式 单线连弧纹镜 这种镜的连弧纹仅为单线阳纹，无柿蒂座，属东汉后期。

III型 柿蒂纹镜类 此型皆以柿蒂纹为主纹，可分3式

1式 蝙蝠形柿蒂座连弧纹镜 此式镜钮的柿蒂座增大，并变成蝙蝠形，与连弧纹共为主纹，间以“长宜子孙”篆文四字，属东汉晚期。

2式 蝙蝠形柿蒂纹镜 这种镜的主纹仅为蝙蝠形柿蒂，制作较差，属东汉晚期。

3式 兽首镜 此式镜的蝙蝠形柿蒂两翼扩大，外带须状纹，柿蒂间有兽首纹。故名兽首镜，属东汉晚期。

4式 带须状蝙蝠形柿蒂纹镜 此式花纹为3式兽首镜蝙蝠形柿蒂纹的扩大，柿蒂间有简单图案，出现在东汉晚期，盛行于六朝初期。

IV型 柿蒂八凤镜类 此型的特点是用形若剪纸两两相对的八凤组成主纹，可分为2式：

1式 柿蒂八凤镜 此式镜钮座外的柿蒂不作蝙蝠形，略似初期型（I型），蒂瓣间距加大，主纹八凤，图案性较强，这种镜出现于东汉末，盛行于六朝初期。

2式 变异柿蒂八凤镜 柿蒂变异成心形，蒂瓣中空，内饰以简单图案。边纹为单线连弧，弧内饰火焰纹或鸟兽纹，非常美观，属六朝初期。

V型 四叶八凤镜类 此型镜体增大，柿蒂变成心形叶纹，整个镜身花纹繁缛，可分二式

1式 四叶八凤镜 此式心形叶内和连弧内皆饰有奇禽异兽，八凤纹近于写实，属六朝早期。

2式 四叶八凤佛兽镜 在四心形叶内各有一尊佛像，其它如1式。此类镜极为罕见，它既反映佛教思想对社会生活已产生影响，又说明当时佛教尚未取得统治地位，故仅用为铜镜的装饰花纹。此镜当为吴镜。

（六）夔纹镜系统